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城 / 马建华, 张力华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3

(遥望星宿: 甘肃考古文化丛书)

ISBN 7-80587-607-X

I. 长... II. ①马...②张... III. 长城-研究-甘肃省 IV. K9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00459号

遥望星宿: 甘肃考古文化丛书

书 名 长 城

作 者 马建华 张力华 著

责任编辑 张国强

装帧设计 刘惠星

出 版 敦煌文艺出版社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网 址 <http://www.dhwycbs.com>

发 行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730030 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插页 12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80587-607-X

定 价 38.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李学勤

总序

“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的编著出版，对于考古界和史学界的专业人士，以及热心关注中国文化传统的广大读者，都是非常值得欢迎的好事。

如丛书编者在策划时所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认识，甘肃都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区。”正由于这样，甘肃在中国考古学和考古学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大家知道，现代考古学在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而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所附《中国考古学年表》，便可看到在1900年以后，甘肃即有敦煌藏经洞文书写本和敦煌附近简牍等重大发现，成为考古工作的先声。近年为众所艳称并被频繁引用的王国维先生1925年的《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演讲，其中提到的四大发现，上述简牍、文书就居其二。现今已形成独立学科并盛行于国内外的简牍学（或简帛学）、敦煌学，其缘起俱不能离开甘肃。

甘肃考古发现影响深远的，自然不限于简牍、文书两项。我们在这里不妨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求解于甘肃。

以下请容我举几个例子——

甘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别是作为仰韶文化分支的马家窑文化，包括半山、马厂类型，早已因其彩陶的高度艺术成就而著名。20世纪70年代以来，秦安大地湾的发掘，展示了甘肃东部存在的仰韶文化所具有的地方特点，并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其中有相当丰富的彩陶，为探索中国彩陶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长期以来，总有人主张彩陶的外来说的问题，可能由此导向解决。

过去一直列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齐家文化，如今不少学者认为应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甚或初期的青铜时代文化。齐家文化和近年确定的四坝文化，都有较多的早期铜器，比如齐家文化的铜镜，是中国最早的第一面同类出土品，即得自广河齐家坪，时在1975年。早年还有一面更大的，传出于临夏，现藏于权威的国家博物馆。这些已经超出一般早期铜器只是小件饰物、工具的范围。其实，迄今已知中国最早的一件青铜器物，是甘肃东乡林家遗址1975年出土的铜刀，属马家窑类型，年代是公元前3 000年左右。看来，要寻求中国青铜器的起源，甘肃乃是具有关键意义的区域。

四坝文化已肯定为青铜文化。另外在甘肃还有辛店、寺洼、沙井等文化，传流更晚。四坝文化大致相当于夏代，而寺洼文化下限竟延至西周晚年。这些文化的族属难于定论，但与殷商甲骨文中的羌、西周金文里的戎有关，是易于推想的。西周王朝的统治力量已及甘肃，在文献内有为周恭王所灭的密国，位于今天的灵台。灵台白草坡出有“泾伯”等青铜器的西周墓，当属于密。西周与大西北的关系是很多的，在《穆天子传》中有不少反映，而我们所知尚很有限。金文里的西北地名，如不其簋、多友鼎及最近所见逯（佐）鼎所记，无疑有些在甘肃境内，有待今后结合田野考古工作进一步考定。

我曾指出，不其簋的作者不其就是秦庄公其。簋铭中的地名有一个是确定的，即在天水西南的西（西垂）。1919年，天水西南发现秦公簋，器上刻有“西”这一地名，见王国维在清华弟子冯国瑞的《天水出土秦器汇考》。1992年至1993年，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发现，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金器等文物，使我们有可能深入研究秦国兴起阶段的历史文化。一部分流散材料的辑集，目前还是当务之急。

礼县发现的文物，如窃曲纹铜钺，已经透露了与欧亚大陆文化

交流的有关信息。至于汉代以后作为这种交流主干的丝绸之路，更是以甘肃的河西为咽喉要径。从汉代的经营西域，到唐朝的对外交通，在甘肃留下了大量古迹，积淀了丰厚遗存。武威雷台的“马踏飞燕”（俗称铜奔马），器形虽小，却以汗血马绝尘奔驰的形象，成为当时开拓精神的象征。其艺术造诣广得称誉，殊非偶然。

至于敦煌石窟及所藏写本，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集中凝聚，也体现了多民族、跨疆界文化的沟通、融会，浩繁博大，便用不着我在此赘言了。

“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共有10种，分别论述古生物与古环境、彩陶、青铜器、早期秦史、岩画与墓葬壁画、古代建筑、简牍、长城、古代民族和佛教艺术，可谓系统全面。执笔者均系有关方面专家，书的质量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以深入浅出的文笔，把多年研究成果和学界最新论点，介绍给读者，是我们应当感谢的。敦煌文艺出版社的各位先生，投入很大精力，出版这套丛书，也应在这里致以敬意。

2003年3月2日于北京

前言

长城，是我国古代一项极为雄伟的防御建筑工程。其中秦、汉、明三个朝代的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一万里。它纵横交错绵延起伏于我们祖国辽阔的土地上。横贯北方的长城好像一条长龙，翻越巍巍群山，穿过茫茫草原，跨越浩瀚的戈壁。长城工程艰巨，气势雄伟，历史悠久，闻名世界。

中国长城的修建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时间，人们提到万里长城的时候，往往将它同秦始皇联系起来。其实远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作为军事防御工程，就有多个诸侯国家修筑过长城。

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抵御其他诸侯的入侵，维护自己政权与领地的安全，先是在各自边界上的关口要隘建起能够传送消息、彼此相望的烽火台和抵御敌国军队的驻军城堡，以便可以尽早地得知敌军的消息从而做好军事防御的准备，又能及时地对入侵者进行反击。随着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战事的频繁升级，为了强化防御能力，各诸侯国只有加强备战，平时他们就在烽火台和防御城堡之间修建了高大宽厚的墙体，将烽火台和防御城堡连接起来，构成了易守难攻、坚固、难以逾越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长城。

甘肃省的长城资源不但丰富，而且非常有特点。因为在中国古代大规模修建过长城的秦、汉、明三个朝代的长城西端，都屹立于甘肃境内的不同地点。每个朝代长城的修建总是与甘肃境内那个时期重大的政治决策变动、军事和经济活动密切相关。随着长城的修建带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变革也带动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变化、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这为甘肃的古代社会带来了繁荣。这三条不同时代、不同建筑风格的长城，至今仍默默地观望着陇原大地，叙述着秦、汉、明三代王朝修建长城的故事。

最初在甘肃境内修建长城的是秦国的昭王。当秦昭王吞并西戎

后，为了防止西部其他游牧民族的侵入，他就开始修建长城了。

秦始皇作为统一的封建集权王朝的皇帝，对长城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修。秦始皇对秦国境内的长城是又拆又建，拆的是战国时期其他六国之间的长城，拆除了封建割据势力可重新起用军事工程的隐患，拆除了六国贵族残余势力妄图恢复旧国的希望，从精神上、从生存条件上彻底地摧毁了六国的残余势力。建的是秦国北部边境的安全线，它从甘肃临洮起一直走向辽东，将自然条件良好、土地肥沃、适宜农业耕作的西部、北部边境用长城围护起来，划出了一条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农业经济区与以畜牧为主的游牧经济区的分界线。它对外抵御着匈奴的侵扰，对内维护境内的正常经济生活，对维护集权制王国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汉代大规模修筑长城是为了彻底地解决匈奴对汉王朝的侵扰。从汉代修建长城的战略方针来观察，汉代长城的修建不但是为了防御，而且是为了更好地扩张。汉王朝建立初，社会经济状况落后，兵力不足，对于北方日益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的不断侵扰难以抵御，汉王朝只好通过守边防备和安抚、和亲策略双管齐下，来维持边界安定。到汉武帝时期，他推行了增加中央王国经济实力的措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了思想，加强了中央集权制，有了反击匈奴侵扰的经济基础和大规模进行军事作战的能力。汉朝大将卫青、霍去病等多次出征西北，把匈奴逐到了大漠以北，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河西四郡。西汉王朝为了巩固新开拓的疆土再次修建长城，把西北的绿洲圈在了长城之内，不仅将长城修筑到大漠以北和西部的高原上，还一直延伸到了新疆的罗布泊，控制了西部的水草丰美之地，切断了匈奴南侵的生存线，巩固了西北边境，繁荣了新拓疆域，加强了中原同西域的联系，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明代又是一个大规模地修建长城的朝代。明长城是我国历史上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也是修建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工程最坚固、设备最为完善的长城。它也是世界上伟大的古建筑工程之一，早已作为地球上人类的奇迹载入了世界文明的史册。但是，明代长城与汉代长城相比较，地理位置大规模地向南、向东退缩。原因是明代始终未能彻底消灭元末残余蒙古贵族的军事势力，只好划地为界，以求自保。但是，明长城的修建阻止了蒙古贵族重新入主中原的企图，确保了农业经济生产地区的安全。

长城的选址要考虑到地势、水源等地理环境，长城的修建又是

大规模的土木工程，这需要综合地运用多门科学，所以长城建筑促进了当时建筑科学的进步，千余年的中国长城建筑史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建筑科学的发展历程。人们可以从宏伟的长城看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为了安全的生活所付出的艰辛。

长城的修建促进了长城沿线屯田经济的发展，长城制止了游牧部族对农业经济区的侵扰和掠夺，保证了农业经济区的社会稳定与繁荣。长城在中国古代将不同经济区的不同民族隔离开，使他们有稳定发展的时间、平等交往的地位、各自生活习惯所适应的经济与生活的空间。在这种相对稳定的环境下，长城两侧地区的社会秩序得以建立，经济得以恢复。安全的社会环境可以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民族与部族之间的正常交往得以建立，并且能进行互利的贸易和友好的文化交流。这种相互影响的经济生活和人文文化、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其实正是民族融合的前期准备。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长城的另一侧民族越墙而过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之后，结果总是中华大地又一次的民族大融合，凶悍的统治者的文化反而消失了，中华民族主体文化更加充实了，这正是在长城维持的和平环境里，各民族文化在安全、限定的空间下，碰撞、磨擦与交流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清王朝不再修筑长城，是因为清王朝汲取了历代王朝管理多民族国家的各种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从“修德安民”的思想出发，尊重和包容汉族知识分子，在实行派驻重臣统治边疆、屯兵驻防等军事措施的同时，还采用怀柔政策，推行与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礼尚往来的友好关系的边疆政策，用宗教和思想统治的办法，代替对长城的修筑。这种文武并举开拓和治理边疆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近代的鸦片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太多的苦难。近代的帝国主义列强对现代科学的滥用，使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灾难远远不是长城这一种仅靠固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所能抵御的。中国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社会文化与科学技术落后，人民贫穷，民族羸弱，思想保守，国力衰弱。但是，磨难是一种经历、是一种刺激，惊雷才能唤醒沉睡的雄狮，中华民族将会继承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努力奋争，自强自尊。邓小平同志“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题词，就是以长城为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标志，昭示着民族毅力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巍然屹立的长城将是历史的见证。



总序



绪论



前言



一、秦长城

(一) 中国长城的修建源于春秋时期 / 002

(二) 秦国长城的西端在甘肃的东部 / 004

(三) 秦国在甘肃东部修建长城的意义 / 005

(四) 秦始皇末年中国第一次大规模修建长城 / 007

(五) 蒙恬小传 / 008

(六) 工程艰巨的秦长城 / 008

(七) 秦长城在甘肃境内的修筑方法 / 009

(八) 秦长城在甘肃东部地区的走向与遗迹 / 011

(九) 渭河、泾水流域中上游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
的发源地 / 019

(十) 考古学观察渭水、泾水流域对
华夏古代文明的贡献 / 020

(十一) 从秦长城透视秦代政治文化 / 025

(十二) 秦长城旁的秦代遗址和直道 / 029

(十三) 从考古学看甘肃东部的秦直道及
秦代遗物、遗迹 / 030

(十四) 直道的开通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 / 033

(十五) 秦长城维护了边境的安全但不能阻止
秦朝的覆灭 / 034

(十六) 秦长城的功过是非 / 035



二、汉代长城

(一) 甘肃境内的汉代长城 / 038

(二) 汉代修建长城的历史背景 / 038

(三) 汉武帝为解决匈奴威胁强化中央集权制 / 043

(四) 匈奴与中原王朝的冲突 / 045

(五) 张骞小传 / 048

(六) 长城是汉王朝与匈奴决战的军事战略工程 / 049

(七) 霍去病小传 / 051

(八) 天马之战 / 052

(九) 汗血马 / 054

(十) 汉长城的西进 / 055

(十一) 居庐仓遗址考古调查小记 / 056

(十二) 河西走廊地区汉代边墙的发现 / 059

(十三) 河西地区汉代长城的军事建制 / 059

(十四) 汉武帝时筑的外城 / 062

(十五) 河西走廊东部的汉代长城 / 063

(十六) 汉代长城的基本结构 / 064

(十七) 汉代边墙 / 065

(十八) 烽燧——守护边墙的据点 / 067

(十九) 烽燧之间的语言——烽火品约 / 071

(二十) 城障是长城防线的战斗堡垒 / 073

(二十一) 关卡——边境安全检查站 / 074

(二十二) 道路是烽燧、坞障之间的系带 / 078

(二十三) 汉长城的军事组织系统 / 078

(二十四) 对戍边吏卒的考核措施 / 079

(二十五) 边塞地区的法律制度 / 081

(二十六) 汉代遗址与出土文物 / 082

1. 玉门关 / 082
2. 大方盘城 / 083
3. 阳关 / 083
4. 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 / 084
5. 悬泉置遗址 / 086
6. 河西汉墓 / 088
7. 陇东汉墓 / 092
- (二十七) 汉代长城的功过 / 093

☆☆☆

三、明长城

- (一) 明长城修建的原因 / 097
- (二) 明长城西端止于酒泉 / 099
- (三) 游击将军芮宁小传 / 101
- (四) 明代长城在甘肃的走向 / 102
- (五) 甘肃境内的明长城遗迹 / 104
- (六) 明长城向南退缩的原因 / 109
- (七) 明王朝对长城的修建与管理 / 111
- (八) 修建明代长城的组织与实施 / 117
- (九) 明代长城的建筑结构 / 119
- (十) 明代长城的兵力部署 / 123
- (十一) 明代的烽火制度 / 124
- (十二) 明代河西的屯田、耕战制度 / 127
- (十三) 茶马互市 / 132
- (十四) 马政功臣——杨一清小传 / 134
- (十五) 甘肃长城沿线的重镇、关隘 / 136
 1. 雄伟的嘉峪关 / 137
 2. 繁华的肃州城 / 147
 3. 山险壁峭的文殊山口 / 149
 4. 肃州北部要冲古城 / 151

- 5. 险峻的石人石马关 / 152
- 6. 壮观的山南关 / 153
- 7. 地势险要的峡口关 / 154
- 8. 山高势峻的扁都口关 / 156
- 9. 军事重镇大靖古城 / 157
- 10. 黄河关锁——索桥堡 / 158
- (十六) 清代罢修长城 / 159
- (十七) 长城的功过是非 / 162



参考文献 / 165

●陈炳应

绪 论

这里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历经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从汪洋大海逐渐演变成山地型高原，屹立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蒙新高原的交会处。地理环境复杂而神秘，有黄土高原、冰川雪山、草原绿洲、戈壁沙漠……孕育中国文明的两大母亲河——黄河、长江，或支流纵横、贯通甘肃南北，或以支流滋润着甘肃的部分地区。

最近一万年来，气候也历经了多次巨变，复杂多样：既有亚热带温湿气候，温带湿润、半湿润气候，也有温带、暖温带干旱气候和高寒半干旱气候，宜牧宜农，既造就了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和多民族格局，也造就了人们强悍、开拓的精神风貌。

甘肃位于我国的地理中心，东与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陕西省相邻，与中原、江南、东北相通；西与多种族、多民族文化汇聚的新疆接壤，从而连通了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和非洲；南临青海、四川，可通西藏、云贵和南亚、东南亚；北连内蒙古、宁夏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而可与欧亚草原和大漠相通。总

之，它成为人们东来西往、南去北进的交通孔道，成为欧亚旧大陆交通、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为国内外各族人民的往来、交流提供了多方面的基础条件，也造就了自古以来多民族聚居的格局。

甘肃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神话传说——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传说他们本是兄妹，后来结为夫妇。他们在混沌初开或天崩地裂、火山爆发、洪水泛滥等自然巨变之后，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立四极以柱地，积芦灰以止淫水；抟土作人，化万物；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以作庖厨；造文字、创历法、画八卦、制嫁娶、设官作乐，以通神明，类万物，治天下；还有钻木取火，尝百草，制九针，立占筮之法等等。其子孙又迁徙四方，繁衍于全国各地。总之，他们是龙的传人公认的共同祖先，是中国悠久、灿烂文明的源头之一。此后，周人先祖躬耕于陇东，秦人先祖牧马于陇南、天水，并分别发展成统一中国的周、秦帝国，为今天的大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汉初期，月氏人从甘肃河西走廊西迁中亚，建立了著名的贵霜王国，成为公元1世纪至3世纪中亚地区的强国，并创造了著名的犍陀罗佛像艺术，使佛教迅速向外界传播，成为今天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同时，乌孙人也从河西走廊西迁伊犁河流域，成为中亚强国之一。十六国时期，甘肃的少数民族——氐族苻氏、羌族姚氏先后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前秦、后秦政权，为民族融合、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甘肃的后凉、南凉、北凉、西秦、仇池、宕昌等政权，也是由甘肃的少数民族创建的，对各地的开发作出了贡献。至于各方面的杰出人才那就更多了，如飞将军李广、哲学家王符、书法家张芝、医学家皇甫谧、收复河西的张议潮、祖籍甘肃陇西的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大诗人李白……都在历史上负有盛名。

神奇的土地，孕育了神奇的人民，创造了神奇的文明。神话传说并不是凭空编造的，而多是自然、社会巨变和古人认识世界的折射，是古代文化的一种，对于我们研究远古世界弥足珍贵。不过，它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发生的事件、发明创造集中于一个人身上，例如上述伏羲、女娲的功绩可涵括距今约几百万年到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还有，因为古代没有文字或有文字而对经济文

化记载过于简略，使今人知之甚少，甚至众说纷纭，疑信参半。如何才能证实、充实呢？近代考古学的产生，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金钥匙。

近代考古学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传播于全世界，并逐步完善提高。它泛指对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一切遗物、遗迹的调查、发掘、研究；研究所获得的社会历史、科学知识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包括考古方法和技术。主要是以田野调查、发掘为主体，以地层学、类型学和以发现的遗物、遗迹为根据，来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变迁。这是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当然还需要多学科的配合）。

我国早在11世纪时就已诞生了收集、研究古代遗物的“金石学”。例如，宋代时甘肃陇西（今渭源县东南）发现了鱼化石，杜绾就进行了研究。他在《云林石谱》中说：“地名鱼龙，掘地取石，破而得之，亦多鱼形，与湘乡（在湖南省）所产不异。古之陂泽，鱼生其中，因山颓塞，岁久土凝为石，而致然欤。”他说的很符合今天的科学。但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则迟至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不过，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成绩斐然，为世界所瞩目。

甘肃的考古工作开始早，成果显著，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例如：

1900年，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今第17窟）和5万多件珍贵古文献。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中国学者周炳南等先后在敦煌的汉塞烽燧中掘得汉简数百枚。可说是甘肃考古的先声。

1920年，法国神父桑志华等在甘肃庆阳县城北25公里的赵家岔和55公里的辛家沟（今都属华池县）的黄土底部砾石层中发现的旧石器，是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第一批旧石器，成为中国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考古的先声。

1923年至1924年，被北洋政府聘为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学者安特生在甘肃临洮等地进行地质考察时，发现了一批史前文化遗址，他根据非常有限的资料就匆忙把甘肃史前文化分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和沙井期，甚至提出中国文化西来

说的错误论点，但立即遭到尹达等先生的质疑和批驳。不过，安特生的发现和研究，却是甘肃、青海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的肇始。

20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籍学者布林在肃北塔崩布拉克发现约1500万年前的“甘肃古猿”化石，轰动了当时的史前考古学界。20世纪40年代，甘肃科学教育馆（省博物馆的前身）的王永焱先生在武都县龙家沟附近发现约1000万年前的“武都森林古猿”和共生的哺乳动物群化石，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森林古猿化石之一，也是世界上森林古猿化石分布最靠北方的地点，对研究古猿类的演变、从猿到人的进程和我国古人类的起源有极高的价值。

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夏鼐、黄文弼、阎文儒等先生，对甘肃的考古工作都非常关注，并多次来甘肃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工作。裴文中先生的足迹踏遍了甘肃的东、中、西部，发现了属于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天水西山坪遗址；调查了属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沙井文化的遗址多处，并提出“沙井文化”的正式命名。夏鼐先生发掘了广河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临洮寺洼山遗址、武威吐谷浑王族墓，并发现了兰州青岗岔半山类型遗址等。他根据科学发掘资料，首次提出“马家窑文化”、“卡窑文化”（即“卡约文化”）、“寺洼文化”的命名；指出安特生“六期说”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错误，并根据寺洼文化遗址发现的火葬墓，结合古文献记载氏羌人的葬俗，得出寺洼文化为古代氏羌人文化的科学结论。夏鼐、阎文儒还在敦煌掘得汉简49枚。前辈们田野调查、发掘资料和经验的丰富积累以及他们精深的研究成果、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后来的甘肃考古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的考古工作更有长足的发展——中央和本省都注重培养文物考古人才，建立了省、地、县三级文物考古机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长年派驻工作人员在甘肃考古队工作，基本上年年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征集工作，发现了一大批非常珍贵的古遗址、遗迹和文物，使甘肃成为全国著名的文物大省。特别是在史前文化遗址、彩陶、长城、汉代简牍、石窟艺术、敦煌遗

书，以及国宝级、国家一级文物的数量及特色等方面更在全国占有明显的优势。与此同时，这些考古资料强烈地激发了甘肃省与国内外很多学科的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和研究热情，他们结合文献记载和历史学、社会学、民族民俗学、自然科学的材料和他省他国的资料，对甘肃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下面按时代择要简介——

在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在泾川大岭上发现了旧石器早期（距今约20万年~30万年以前）甘肃先民生活的遗址和打制石器。在镇原姜家湾、寺沟口发现了旧石器中期的遗址和遗物。而旧石器晚期遗址、遗物则在甘肃东、中、西部都有发现，多达20多处。其中，泾川牛角沟发现的“平凉人”头盖骨化石，武山鸳鸯镇大沟、骨头沟发现的“武山人”头盖骨、肋骨化石，庄浪朱店乡长尾沟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环县刘家岔遗址发掘的数以千计的石器、石制品等，都尤为重要。经研究，上述甘肃旧石器文化源于我国华北地区同时代的文化，而古人类化石的体质特征又是早期蒙古人种类型，因而可以断定，甘肃先民是中国本土的土著居民，后来的新石器文化与此一脉相承。

甘肃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的成绩更为显著，主要表现为：

其一，调查和发掘了几千处遗址、几千座墓葬，有充分的证据推翻安特生的“六期说”和“中国文化西来说”，基本上确立了甘肃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即：大地湾一期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谢端琚先生最近出版的《甘青地区史前考古》一书提出：“师赵村一期文化”应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分出来，作为“大地湾一期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的一种单独文化），其时间跨度从距今约8 000多年一直到距今约2 000多年，绵延不断长达约6 000年！大量的资料证实，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开始出现的彩陶与西亚两河流域的彩陶是世界上最早的、同时创造的两种彩陶文化，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而且，甘肃的彩陶文化存在时间长达约5 000年，数量多，分布区域广，纹饰繁复、多样、精美，艺术成就高，学术价值高，堪称全国之冠！

其二，发现了甘肃先民许多杰出的发明创造，如约7 000年至约8 000年前种植的粟、油菜籽，发明的纺织技术、彩陶、文字雏形（彩绘、划刻符号）；约5 000年至6 000年前建造的大型宫殿建筑（总建筑面积420平方米）和水泥地面、地画、精美的彩陶、窑洞式建筑和陶鼓；约3 000年至4 000年前发明的青铜冶铸技术、青铜雕刻技术、青铜分铸镶嵌技术以及具纽铜镜、凸面镜、大型陶水管的制造和使用，大麻的种植，马的饲养与使用等等，都是全国首创或最早的发明之一！它们不仅可以复原当时甘肃各地不同人群、民族的社会、文化面貌，而且也充分显示了甘肃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对我国古文化、文明的杰出贡献。秦安大地湾遗址长达3 000年的历史积淀，为伏羲、女娲诞生于甘肃成纪之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其三，涌现出一批精深的研究成果，上述两个方面都是研究的结晶。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重要彩陶纹饰之一的蔷薇科与菊科花卉图案，可能是华夏民族“得名的由来”，庙底沟人是形成华夏民族的“核心”，华夏民族及其文化“无疑是土生土长的”。

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提出：从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的“地望”、“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具备的特有表征”来看，“显然应当是羌人”的文化。而“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就是发展得较早的一些羌人文化的先驱”。胡谦盈先生认为四坝文化也是古代羌人的文化。任乃强先生更认为，甘青地区所有的石器文化都是上古羌族的遗留。

林梅村先生在研究了甘肃、新疆若干史前文化之后得出结论：“正由于甘青地区汉藏语系羌人的崛起，才阻挡了印欧人大举东进。否则，中国文明将像印度河古文明或两河流域古文明一样，毁于印欧人的大规模入侵。”

他们都把甘肃的考古资料用于研究全国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并取得可喜的成果，再次显示了甘肃考古和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甘肃先秦时期考古成果显著，成绩斐然。

庆阳、平凉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父乙铜爵、父丁铜觚、父丁有盖铜角、父辛铜斚、父癸铜卣和“乍册吾”大玉戈等，工艺精